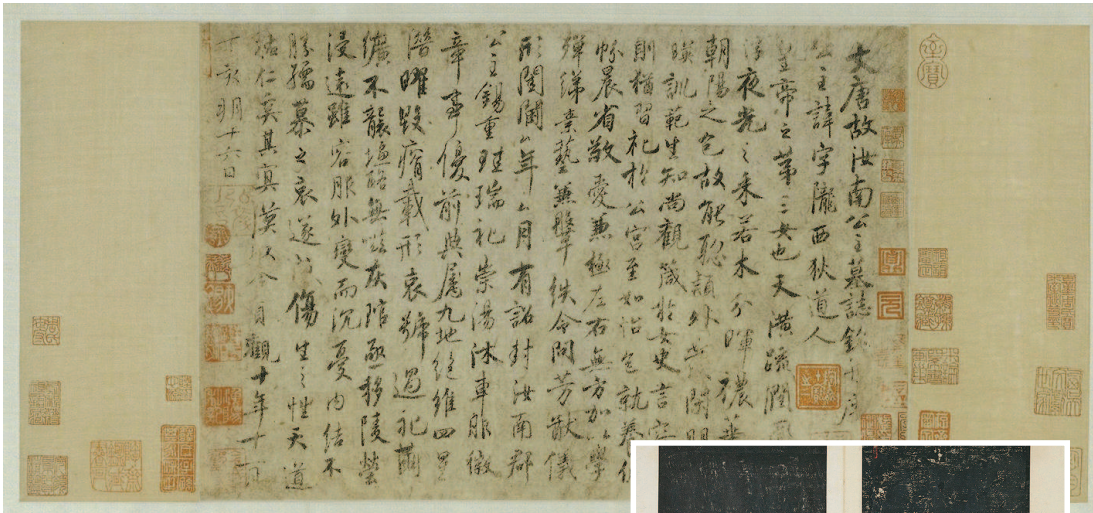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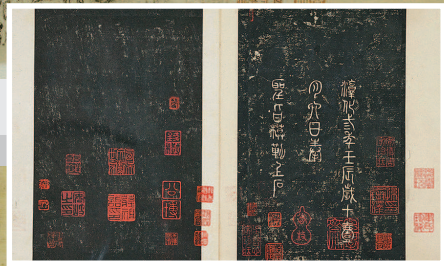


国家艺术杂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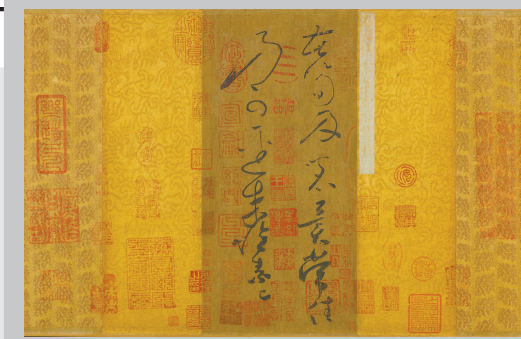


▲ 唐虞世南行书《汝南公主墓志铭》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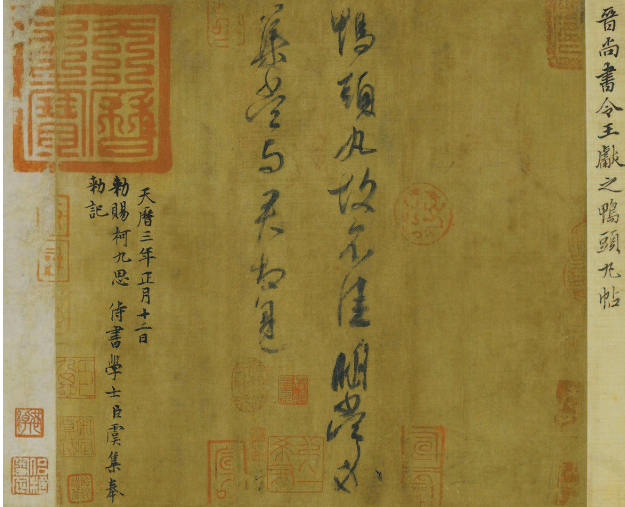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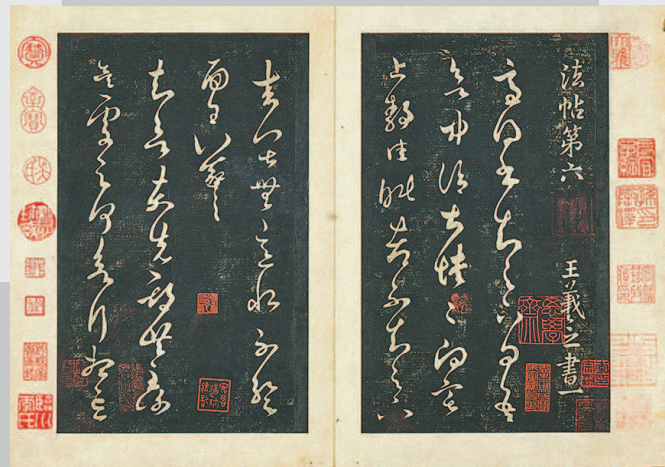
▶ 《淳化阁帖》(卷尾)



▶ 《淳化阁帖》(其中一卷)



◀ 唐怀素草书《苦筍帖》



▲ 东晋王羲之《鸭头丸帖》

关于“帖”的那些事

上海博物馆东馆书画展厅自重磅回归以来,拿出了不少国宝级馆藏。书法展厅里,继东晋王羲之草书《上虞帖》卷、唐怀素草书《苦筍帖》卷之后,更换上新了宋拓修内司本《淳化阁帖》、东晋王羲之草书《袁生帖》页、唐虞世南行书《汝南公主墓志铭》卷等。

在中国书法中,“帖”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重要概念。爱好者如何欣赏“帖”?书法墨迹如何传世?本刊特约上海博物馆副研究员孙丹妍为读者讲讲关于帖的那些事。

——编者

◆ 孙丹妍

墨迹

“帖”作为名词,有两个读音:tiè与tiē。读作三声时,主要指官府的各类文告,《木兰诗》中“昨夜见军帖,可汗大点兵”、杜甫《新安吏》中“府帖昨夜下,次选中男行”,其中的“军帖”“府帖”即此。后来也泛指各种写有简短文字的柬帖,比如拜访时用的名帖、结盟时用的盟帖、订婚时用的庚帖、邀请客人时用的请帖等等。

读作四声时,指写在帛上的书签——这也是“帖”字的本义——引申为书法的临摹范本,历代大书法家的书迹被后人反复临摹,多以某某帖命名,比如陆机的《平复帖》、王羲之的《鸭头丸帖》,王羲之《兰亭序》的别名也叫《禊帖》。可见,“帖”有点类似尊称,能被称作帖的,必然是名家名作。这里所说的帖,都是墨迹本,就是书法家亲笔所写的真迹,或者是“下真迹一等”的摹本,这是书法界鄙视链的顶端,书法艺术王冠上的明珠,因为只有它们保留下了书法家最原始、最真切的书写状态与书写痕迹,是最珍贵的艺术品和最珍贵的第一手资料。

古代书法家,尤其是晋唐书法名家的真笔墨迹寥若晨星,两晋只存留了两件:西晋陆机的《平复帖》与东晋王珣的《伯远帖》。唐代书家墨迹略多,但没有争议的也属凤毛麟角,赫赫有名的“颠张狂素”(张旭与怀素),留存下的墨迹若干,基本没有疑议的亦只得怀素《苦筍帖》一件。

摹写

书法史上地位最高、声誉最隆、学者最多的王羲之、王献之父子并没有真笔墨迹传世,好在我们能看到几乎与真迹无差的临摹本。临和摹是复制书法的两种方法,前者是将原件置于一边,观察体味之后书写出来,后者则是用半透明的纸张附在原作之上,用极细淡的线条勾出字形轮廓,再根据原作填入浓淡不一的墨色。

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被唐太宗带入昭陵,对

于后世热爱书法的人们来说,李世民对此举唯一稍能弥补的是,《兰亭序》最精美的临摹本同样出于他的授意。大唐最著名的书法家和最高明的摹书手给后人留下了冯承素摹本、虞世南临本以及褚遂良临本。冯承素用的是勾线填墨的方法,加上技法精微,所以此本与原作为最接近。虞世南与褚遂良本身就是大书家,他们对照临写,意在取神,因此都带有个人的书写特点,尤其是虞世南本,墨色因皮损而显得古雅清淡,笔画则圆融毓秀,别有一种萧散冲和的韵味,这韵味与其另一墨迹《汝南公主墓志铭》似有相通之处。自然,高古留存年代久远,信息渺茫,所谓冯摹、虞临与褚临也只是在有限范围内,在前人的经验上做出的最接近真相的判定。就如《汝南公主墓志铭》,虽然书法道媚精妙,历代不乏著录,且钐有可能是唐代弘文馆所用的“弘文之印”,但仍有不少学者从文献、题跋、印章以及笔法方面提出是宋摹本,甚至是米芾临本的质疑。然而,这丝毫不影响这件作品的价值,它使我们得以窥见虞世南书法的真面目。

唐代另一次对王羲之家族书法的集中摹写由武则天主持。万岁通天二年,武则天访求王羲之墨迹,侍郎王方庆遂献出其十一世祖王导、十世祖王羲之、九世祖王献之、王徽之、王珣直到曾祖父王褒等王氏一门共二十八人的真笔墨迹十卷。后来武则天不欲夺其所宝,就命人将这些墨迹一一摹写在宫中,原本仍然还与王方庆。这一举动不但彰显了武皇的宽仁,也为后世又存留了一笔王氏书法的宝贵讯息——后来王氏保存的真本亡佚殆尽,而摹本在两次火灾后幸存下王羲之、王献之等七人十帖,合为一卷,称《万岁通天帖》。此帖由于出自宫廷高手,摹写极尽精妙,用笔使转回旋,如在眼前,启功先生推为唐摹王帖之冠,超过了流于日本久负盛誉的唐摹王羲之《丧乱帖》与《孔侍中帖》。更难得的是,在《万岁通天帖》中,除了羲献父子,还有王荟、王僧虔等五位书法家的作品,展现了东晋到南朝书法家群体的丰富面貌。

刻帖

然而,纤毫不爽、呕心吐胆的临摹本虽几可与真迹同观,却也只能满足极少数皇室贵胄的需求,无法广为传播,且一旦遭遇意外,很有可以一起毁损。于是,出现了刻帖。刻帖,就是将名家的书法摹刻到石板或木板上,然后再将其拓印到纸上,如此便可大量复制流传。因此刻帖并非墨迹,而是一种黑底白字的印刷品。同样是在石头上刻字,刻帖与早就出现的刻碑有本质上的不同,刻碑是为了记事或纪功,刻帖则是为了保留古代优秀的书法作品,刻碑非必名手,刻帖则定为名作。刻帖又分为单刻帖与丛刻帖,单刻帖只刻一种法书,丛刻帖则是多人多种法书的汇编。最著名的单刻帖仍可追溯到唐太宗,他得到《兰亭序》真迹后命当时的大书家临摹,除了上文提到的冯、虞、褚三家之外,与虞、褚并为“初唐四家”的欧阳询也临有一本,据说太宗令其摹刻上石,拓赐近臣,石头则藏于学士院。欧阳询的临本早已不存,而这块石头在五代时被移到汴都,直到后晋。辽灭晋,太宗耶律德光载石北归,途中病亡,弃石于杀虎林。北宋庆历年间,石头在定武(今河北定州)被发现,从此石所出的刻帖,便被称为“定武兰亭”,自此名扬天下。此后,与所有的宝物一样,这块石头的命运跌宕起伏,时隐时现,更有好事家另刻他石以鱼目混珠,因此各种拓本层出不穷。现在的学者多认为原石在宋室南渡时就消失了,唯一被认为出自原石的拓本是元代天台長老独孤氏所藏,被他赠予大书法家赵孟頫,赵欣喜若狂,连连题跋十数次,便是后世艳称的“兰亭十三跋”。可叹的是,这件拓本在清代遭遇火灾,只幸存下三小片,六十余字。

丛帖

唐代末年,刻碑技术与雕版印刷术已较为成熟,于是大约在五代时,就有了丛帖的刊

刻。据宋人周密在《云烟过眼录》中的记载,南唐后主李煜曾诏徐铉将内府所藏前代法书摹刻上石,汇编成《昇元帖》,可惜并没有实物流传下来。

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丛帖,出现在文治天下的北宋。北宋淳化三年,宋太宗命翰林侍书王著摹刻秘阁所藏历代墨迹,编为十卷:第一卷为历代帝王书;二、三、四卷为历代名臣书;五卷为诸古法帖;六、七、八卷为王羲之书;九、十卷为王献之书,共收先秦以来一百零二位书法家四百余件作品,天下名迹尽收于此,号为《阁帖》,因在淳化年间刊刻,又称《淳化阁帖》,后世誉为“法帖之祖”。《淳化阁帖》完成后藏于内府,只有近臣才偶尔得赐,在北宋就十分珍贵,因此公私翻刻众多。所谓翻刻,就是根据最初的拓本,再次摹刻上石。而从第二次翻刻的石上拓下的拓本,亦可以此再翻刻第三次,以此类推,可以无限翻刻与传播。《淳化阁帖》仅在宋代就有三十多种翻刻本,加上后世的不断翻刻,形成了令人生畏的庞杂系统,而刻帖的考证与鉴定也成了最繁难的一门学问。今天所见的各种版本的《淳化阁帖》中,著名收藏家安思远旧藏,后归上海博物馆的宋拓《淳化阁帖》第四、六、七、八卷为历史上公认的传世最佳善本。

《淳化阁帖》的刊刻,不仅是宋太宗乃至整个宋朝“以文德致太平”理念的体现,也是中国书法艺术传承与发展的里程碑,其重要恰如赵孟頫所感叹“书法之不衰,此帖之泽也”。它不但使先贤名迹,尤其是二王书迹得以广为传布,更开启了后世官私刻帖的风气,随着各种版本刻帖的流行,魏晋书法尤其是二王书风成为宋、元、明、清四代书家研习的主流,而后世所谓“帖学”书法的形成,其发端正在于此。至于这股风潮如何绵延近千年,如何在清代中后期逐渐衰微,最后被异军突起“碑学”书风所压倒,那又是另一个有趣的故事了。